

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

(1927—1934)

(文献资料选编)

◆姚金果◆陈胜华 / 编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

(1927—1934)

(文献资料选编)

姚金果 陈胜华 编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1927—1934)/姚金果,陈胜华编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9

ISBN 7-5073-2167-3

I. 共... II. ①姚...②陈... III. ①共产国际-史料
②中国工农红军-史料 IV. ①D16②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7161 号

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 (1927—1934)

编 著/姚金果 陈胜华

责任编辑/王春明

封面设计/张 戈

版式设计/寇 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版印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787 × 1092mm 16 开 25.5 印张 400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3-2167-3

定价: 49.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编者说明

为了配合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的教学工作，我们特选编这本文献资料集。本书收集了 1927 年至 1934 年间，联共（布）、共产国际有关领导机构和领导人、驻华代表，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会议决议、指示、报告、书信、文章等与朱毛红军有关的内容。阅读本书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一、本书除收集与朱毛红军有直接关系的文件外，还收集了与朱毛红军有关的背景资料，以便帮助读者了解朱毛红军的存在与发展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关系。

二、本书所收文件是由外文译成中文、在国内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文件名后标明“节选”的，表明只选取了该文件的部分内容。

三、注释一般为原作者和原编、译者所加。凡标明“编者注”的，为本书编者所加。

四、原稿中有明显文字、标点等技术性错误的，在选编时作了必要的纠正。



导 言

导

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对朱毛红军的关注，是同它们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关注相始终的。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前，联共（布）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就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建议，但遭到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的攻击和反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开始苏维埃运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对于何时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个问题，联共（布）领导人当时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相继爆发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很短时间内对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作出了几个重要指示，指示的内容前后也有很大变化（第2、3、4号文件）。8月，它认为现在只是宣传苏维埃口号的时期，只有在以下两个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能建立苏维埃：第一，争取国民党已经无望；第二，出现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9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向罗米纳兹发出如下指示：建立苏维埃的时机，应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局和中共中央来决定。然而，此时中共中央在罗米纳兹推动下，已经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具体措施。也就是说，已经将宣传苏维埃运动时期转变为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0月6日对建立苏维埃政权作出9项具体指示。可以说，至此联共（布）才彻底放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赋予罗米纳兹和中共中央“确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和扩大苏维埃地区的权力”。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要求，中共中央在罗米纳兹指导下，于9月19日作出《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指出“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11月1日，中共中央在《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中，明确提出党现时的政策就是发动工农



武装暴动，推翻一切军阀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盲动和急躁情绪也在滋长，盲目暴动不计后果的情况屡有发生（第6、8号文件）。这一现象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共产国际于1928年2月电告中共中央（第7号文件）：“绝对禁止进行没有准备好的过早的发动。目前我们反对举行暴动。”然而，被盲动情绪冲昏头脑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无法冷静下来，他们竟指责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对中国的革命形势没有充分的估计（第11号文件）。直到这年6月，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集中到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时，他们对自己在这一时期的盲动和急躁情绪才有了比较明晰的认识。作为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不得不承认，他们不理解什么是起义，犯了盲动主义错误（第14号文件）。

从1928年开始，为了全面指导中共中央开展苏维埃运动，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有关部门和领导人倾注了大量心血，党的建设、红军的发展和建设、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工作方向、瓦解军阀部队的工作、为中共培养军事干部，以及在红军占领区域如何发动农民、建立政权等等，莫斯科方面对这些工作都提出了非常有针对性的指示和建议（第9、10、12、16号文件）。

本书所收的文件表明，最早引起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给予关注的，是1928年1月米凯特维奇来自上海的报告（第6号文件）。这份报告指出，在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的活动区域——湖南、江西，农民暴动正在进行，而且建立了4个县苏维埃政权。报告中所谈的情况虽有不准确之处，但他还是明确无误地写道：“在湖南，毛泽东的军队正在扩充。”同年5月，更加详细的报告到达莫斯科。这份报告用了“湘赣的形势相当好”来形容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所取得的胜利（第13号文件）。

1928年12月初，彭德怀率平江起义余部800余人上了井冈山，朱毛红军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了消灭这支部队，1929年1月初，国民党湘赣军联合对井冈山地区进行“会剿”。为了保存实力、消灭敌人，柏露会议采取了毛泽东“围魏救赵”的策略，决定留彭德怀等率部坚守井冈山，朱毛率红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得知这一消息，于1929年1月29日决定援助朱毛红军的问题。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共产国际文件中，第一个关于朱毛红军问题



的决定（第 17 号文件）。这一决定显示了共产国际对朱毛红军的重视程度。

为了进一步有效地指导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于 1929 年 3 月在上海设立了新的远东局。有资料表明，由于复杂的客观情况，远东局成员能够获取的有关各地情况的报告非常有限，也非常不及时，这就为他们作出正确决策造成了障碍。再加之他们个人的水平和经验有限，他们不仅未能有效地制止中共中央的“左”倾冒险情绪的膨胀，而且由于同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的不断争论和尖锐矛盾，使双方都失去了对一些问题判断的准确性和决策的及时性（第 22、25、38、39、44 号文件）。这对于当时急于得到正确指示的朱毛红军以及其他红军队伍，无疑是非常有害的。文件表明，在对抗远东局的斗争中，在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盲目乐观的估计上，李立三并不是孤家寡人，实际上当时中共中央的几个重要领导人都与他站在一起，有着同样的认识（第 29、34 号文件）。从本文件资料集收录的 1930 年 6 月 25 日向忠发给周恩来的信（第 27 号文件）和同年 8 月 8 日向忠发给斯大林的信（第 37 号文件）中，读者可以从中一窥作为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当时所持的观点。在给周恩来的信中，他认为，真正的革命高潮，即直接革命形势正在临近，党应该全力来完成首先在一省或数省夺取政权的任务，但远东局却“竭力阻挠”中央发表相应的决议。信中列举了中央实行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工作方针共 11 项，要求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很好解释”，以“肯定”这一方针。信中还表示，此时中央将“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口号已经改变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与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的口号。他还着重谈到“进攻武汉”的问题，认为共产国际对首先在武汉取得胜利持怀疑态度是不对的，希望周恩来为中央辩护。但是，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左”倾冒险错误给予了批评和疏导（第 30、40、41 号文件）。对此，向忠发颇为反感。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向忠发对中国革命形势作了非常乐观的估计，对于占领武汉、南京等大城市充满信心。信中还告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状，认为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令向忠发没有想到的是，斯大林非但不赞成中共中央的做法，反而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中国人的倾向是荒诞的和危险的”（第 43 号文件）。然而已经被冒险情绪冲昏了头脑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仍然坚持自己的“左”倾冒险政策，不顾远东局的劝告（第 47 号文件），口气

强硬地为自己的言行进行争辩（第45、46号文件）。最终，还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出面，认可了共产国际的一个重要决议。这个决议对李立三等人进行了严厉批评，指责他们坚持在汉口、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举行暴动是“最有害的冒险主义”（第48号文件）。李立三的政治命运就此出现转折。1931年1月1日，被共产国际勒令到莫斯科的李立三承认：“我犯了一个极大的政治错误。”（第63号文件）

尽管有许多不便和困难，远东局在华工作期间，对中共中央还是尽量给予了指导，对中国红军的状况也给予了尽量的关注（第52、53号文件）。远东局成员雷利斯基在1929年7月8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信中表示，在各地频繁发起的武装暴动中，党已经采取措施确保暴动队伍“不蜕化成土匪集团”。信中还提出“在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情况下，红军可能成为全国革命红军的萌芽”（第18号文件）。1930年2月以前，全国到底有多少红军？并没有一个具体而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从1930年2月远东局的一个报告中可以看出，红军当时的队伍已不下3万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区已有19个，而这些队伍中党的支部活动“最出色”的，是朱（德）毛（泽东）和彭（德怀）黄（公略）的部队（第19号文件）。

1930年2月，朱毛红军出击赣南闽西后，开始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这以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不时接到驻华代表有关朱毛红军活动情况的报告，从而对朱毛红军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其中1930年4月来自马马耶夫的报告，用大量篇幅对朱毛的情况作了非常详细的叙述（第21号文件）。尽管其中有一些数字和部队编制有误，但总的来说，这份报告是基于十分详尽的资料撰写而成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朱毛红军的非常珍贵的史料。直到1930年10月，莫斯科驻华代表仍然认为，在中国的红军队伍中，朱德和毛泽东的军以及处在他们影响下的两个军是最好的；彭德怀的军以及在他影响下的两个军与它们差别不大（第54号文件）。

从1930年夏起，联共（布）与共产国际提出了在中国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的任务。为此，共产国际及远东局对中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指示，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指导。文件表明，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几乎所有文件都是由共产国际指定有关人士起草的。至于毛泽东，他能够进入苏区中央局和担任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也是受到共产国际重视的结果。另外，在保存和发展红军队



伍、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共军事部的构成和任务等方面，共产国际都提出具体的建议（第23、24、26、28、31、36、62、64、65、66、71、72号文件）。

1930年7月27日，朱毛红军一部由彭德怀指挥，攻下了湖南省会长沙。消息传到莫斯科，《真理报》即于7月31日发表社论，对于朱毛红军进攻长沙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意义异常重大的事件”（第32号文件）。远东局也为朱毛红军的此举所鼓舞，认为只要红军巩固了在长沙的阵地，就可以提出在长沙成立苏维埃政府的问题（第33、35号文件）。然而，红军占领长沙不到10天，就在敌优势兵力的压力下撤出了长沙（第42号文件）。

红军从长沙撤退后不久，中共中央又提出了第二次进攻长沙的军事计划。远东局认为，如果只能短时间地占领长沙并且以重大牺牲为代价，那么应该放弃重新攻占长沙的打算（第51号文件）。然而，中共中央没有听从远东局的劝告，于是有了彭德怀指挥军队第二次进攻长沙的行动。关于这次攻长沙的情况，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一份报告中比较详细的叙述。这份报告印证了人们的一种说法：红军在进攻长沙时，为了突破城周围的电网，将近1000头公牛点燃尾巴冲向电网，但这样做毫无结果。甚至还出现了黑暗中自己人互相对打的情况。因此，报告认为，在进攻长沙的问题上“暴露了我们从组织上、政治上和技术上整体的无能”（第54号文件）。

1930年10月底，当第三次进攻长沙的计划提出之后，远东局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中共中央，并且指出：“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的行动再一次有力地说明，在上海和苏区之间尽快建立通讯联络机构和在苏区建立坚强的军事政治领导是必要的。”（第56号文件）考虑到当时的具体形势，第三次进攻长沙的计划实际上并未执行。

从远东局的有关报告中还反映出，远东局成员认为，在一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中，对苏维埃政权与党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清楚。在一些地方虽然存在着苏维埃政权，但政权是由党来掌握的。对于党与苏维埃政权各自的职权问题，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领导人并不重视，认为战争期间不必做这件事。报告还指出，毛泽东对政府工作不感兴趣（第54、57号文件）。不过，远东局成员对于朱毛红军的团结和战斗力，还是非常欣赏的（第59号文件）。1931年2月10日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中（第67号文件），具体报告了朱毛红军的活动区域和武器

情况，对第一次反“围剿”的作战情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这对于研究中央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战况是一个很好的补充资料。

关于富田事变，目前研究者能够看到的资料少之又少。而本书收入的文件（第61、67、68、69、70号文件）反映了富田事变前朱德和毛泽东等人的矛盾、富田事变的经过、两个赴上海代表团对事变的不同说法、远东局对富田事变的态度，等等。通过这些文件，读者可以对朱毛红军的历史上这一悲剧性事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也可以澄清以前一些比较模糊的认识。1931年3月18日，远东局专门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策划和进行的“反革命活动”，其目的是“旨在消灭我们党的队伍和红军，消灭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而“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第73号文件）。10天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这一决议的内容基本上与远东局的决定相一致，对富田事变的定性也完全相同。

远东局在富田事变中完全支持毛泽东领导下的前委，然而他们此时对朱德、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口号也存有担心。1931年3月38日，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提到，朱德、毛泽东曾提出过“从肉体上消灭所有富农”的口号，并且用一些行政命令口号取代组织对乡村贫农的组织工作和对同富农的群众性斗争的领导工作。远东局认为：“这些口号只能吓唬农民群众并使他们疏远我们。”这也是目前看到的唯一一份记录朱毛有过此提法的文件。远东局从何处得知这个消息的？这个消息是否可靠？尚需进一步考证。尽管如此，远东局仍然认为，朱德、毛泽东是红军中“坚强的干部”（第76号文件）。

从1931年开始，红军接连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而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红军的胜利充满了信心。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上，曼努伊尔斯基对中国的苏维埃和红军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使整个殖民地世界日趋革命化”，并且特意提到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第74号文件）。在盖利斯关于苏区和红军的报告中，也认为红军经过反“围剿”斗争，其力量比过去大大增强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明确指出：“红军是真正的农民革命军，有很有威望的无产阶级领导。”报告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朱毛红军的反“围剿”斗争（第78号文件）。为了指导各苏区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和苏维埃政权建设，远东局多次督

促中共中央向各苏区派遣代表。收入本资料集的一份文件详细记录了从1930年9月至1931年4月间中央派向苏区的人数和到达的人数。通过两个数字的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在极为严酷的环境下，有许多同志根本无法到达指定的地点（第79号文件）。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中央苏维埃政权的设想终于成为现实。为此做出贡献的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领导人米夫特意在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热情洋溢地宣传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重大意义，对中国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给予了同情和肯定，对中国红军和苏维埃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中国红军今后的斗争前景，苏维埃运动今后的发展前景，毫无疑问是壮丽的”。他还详细介绍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即将通过的一系列法令和法规，认为这些法令和法规的贯彻，必将为苏维埃在全中国的最后胜利铺平道路（第80号文件）。

遗憾的是，本资料集有关 1932 年至 1934 年间的文件相当匮乏。这一缺憾可望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弥补。但所收入的不多的几个文件表明，1933 年至 1934 年期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利用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和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反“围剿”胜利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他热情宣传苏维埃政府所取得的各项成就，还特意提到了任主席的毛泽东（第 81、82 号文件）。

目 录

目
录

导言.....	(1)
---------	-----

第一部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

(1927年8月——1930年2月)

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特字第97号) 记录(摘录)(节选)(1927年8月11日)	(3)
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0号(特字第98号) 记录(摘录)(节选)(1927年8月13日)	(5)
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5号(特字第103号) 记录(摘录)(节选)(1927年9月22日)	(7)
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28号文件(摘录) (1927年10月6日)	(9)
5. 布哈林给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报(摘录) (1927年10月31日)	(11)
6. 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8年1月)	(12)
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28年2月4日)	(30)
8. 阿尔布列赫特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 (1928年2月29日)	(31)
9. 米夫给布哈林的信(1928年4月6日)	(38)
10. 布哈林给米特凯维奇的电报(1928年4月7日)	(40)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 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决定(1928年4—5月)	(41)
1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军事工作的 训令(1928年5月4日)	(43)
13. 李维汉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	



(1928 年 5 月 25 日)	(55)
14.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记录 (1928 年 6 月 27 日)	(58)
15. 米特凯维奇的书面报告《中国苏维埃经验》 (1928 年 7 月 10 日)	(61)
16.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决议案 (不晚于 1928 年 7 月 25 日)	(64)
1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远东部会议第 8 号 记录 (节选) (1929 年 1 月 29 日)	(68)
18.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 第 4 号信 (节选) (1929 年 7 月 8 日)	(69)
1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 报告 (节选) (1930 年 2 月)	(71)

第二部分 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

(1930 年 3 月—1934 年 10 月)

20. 马马耶夫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 会议提交的报告提纲 (1930 年 4 月 14 日)	(79)
21. 马马耶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 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1930 年 4 月 15 日)	(84)
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 年 5 月 1 日)	(103)
2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稿 (1930 年 6 月 16 日)	(109)
2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0 年 6 月 19 日)	(111)
2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 年 6 月 20 日)	(113)
2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 年 6 月 22 日)	(118)
27. 向忠发给周恩来的信 (节选) (1930 年 6 月 25 日)	(120)



2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早于 1930 年 7 月 10 日) (124)
29.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30 年 7 月 18 日) (126)
3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0 年 7 月 23 日) (127)
3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红军建设和游击运动问题给
中共中央的指示信 (1930 年 7 月 29 日) (128)
32. 中国革命的重大胜利 (社论) (1930 年 7 月 31 日) (137)
3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信
(1930 年 8 月 1 日) (140)
34. 斯托利亚尔给洛佐夫斯基的信 (摘录)
(1930 年 8 月 5 日) (143)
3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的信
(1930 年 8 月 6 日) (148)
3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
(1930 年 8 月 8 日) (149)
37. 向忠发给斯大林的信 (1930 年 8 月 8 日) (152)
3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
电报 (1930 年 8 月 8—9 日) (155)
39.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摘录)
(1930 年 8 月 8—9 日) (156)
4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0 年 8 月 9 日) (158)
4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 (1930 年 8 月 9 日) (159)
42. 别尔津和图梅利陶关于中国军事政治形势的书面报告
(节选) (不晚于 1930 年 8 月 10 日) (160)
43.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电报 (摘录)
(1930 年 8 月 13 日) (162)
4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 年 8 月 13 日) (163)
45.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电报

- (1930年8月16日) (166)
46.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信
(1930年8月16日) (168)
4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8月17日) (170)
4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号(特字第X号)
记录(摘录)(1930年8月25日) (174)
49.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
(1930年8月25日) (177)
50. 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节选)(1930年8月26日) Г·萨法罗夫 (179)
5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9月2日) (183)
5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10月15日) (185)
5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30年10月20日) (187)
54.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节选)(1930年10月20日) (195)
55. 斯托利亚尔给洛佐夫斯基的信(摘录)
(1930年10月20日) (201)
5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10月30日) (208)
5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0年11月10日) (211)
58. 瞿秋白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1930年11月29日) (213)
59.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书面报告(1930年11月30日) (218)
60. 米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节选)
(1930年12月2日) (222)
61.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0年12月3日) (226)
62. 斯卡洛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和东方书记处的
书面报告(不晚于1930年12月28日) (232)
63. 李立三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提出的



声明 (1931 年 1 月 1 日)	(240)
6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电报稿 (1931 年 1 月 11 日)	(243)
6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书面报告 (1931 年 1 月 17 日)	(245)
66. 盖利斯给周恩来的信 (1931 年 2 月 4 日)	(247)
67.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 (节选) (1931 年 2 月 10 日)	(253)
68. 别斯帕洛夫同温裕成和秦邦宪谈话记录 (节选) (1931 年 2 月 11 日)	(266)
69. 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周恩来谈话记录 (节选) (1931 年 2 月 19 日)	(270)
70. 盖利斯、米夫和马雷舍夫同任弼时谈话记录 (1931 年 2 月 19 日)	(273)
7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书面报告 (1931 年 2 月 20 日)	(277)
7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 (摘录) (节选) (1931 年 2 月 22、23、25、28 日)	(279)
7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 (1931 年 3 月 18 日)	(283)
7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第二次会议上 曼努伊尔斯基的报告 (节选) (1931 年 3 月 26 日)	(288)
75. 雷利斯基同周恩来、张国焘和向忠发谈话记录 (节选) (1931 年 3 月 27 日)	(290)
7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的信 (摘录) (节选) (1931 年 3 月 28 日)	(295)
7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第九次会议上 刘先的发言 (1931 年 3 月 31 日晚)	(301)
78. 盖利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 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苏区和红军》的副报告	



(1931 年 5 月 7 日)	(307)
79.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 (节选)(1931 年 6 月 10 日)	(318)
80. 中国的革命斗争(1931 年 11 月 13 日)	Л·米 夫 (322)
8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第六次会议上 王明的发言(1933 年 11 月 30 日晚)	(328)
82. 中国革命是不可战胜的(1934 年 2 月 5 日)	王 明 (370)
有关人物简介	(376)
有关文献目录	(387)
后 记	(389)

